

1950~1978年朝鮮（韩国）文學的中譯研究

金鶴哲*

目次

1. 前言
2. 1949~1965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朝鮮文學翻譯
3. 1966~1978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朝鮮文學翻譯
4. 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文學界对韩国文學的认识
5. 一元化的意識形態对翻譯的制約和操纵
6. 小結

1. 前言

文學翻譯活動在五十年代的中國掀起了一个高潮，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在五十年代被有組織有計劃地譯介進來。這一翻譯熱潮在六十年代初逐漸降溫，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文革爆發，基本上中斷了外國文學的翻譯活動，直到文革末期才開始逐漸恢復。這一時期中國的文學翻譯被罩上了更為濃厚的政治色彩，反帝反封建、階級鬥爭、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改造個人、保衛和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是這一時期的主流意識形態，而且國家話語和主流意識形態完全一致，形成了高度集權的一元化意識形態格局。本文主要考察在這種譯入語環境里，朝鮮（韓國）文學在中國的譯介情況，分析冷戰意識形態和當時中國社會一元化的意識形態語境和國家權力，是如何制約和利用朝鮮（韓國）文學作品的選擇和翻譯的。而且作為一項基礎研究，期待為以後的研究者提供一份基礎資料。

* 韩国水原科学大学观光中国语系专任讲师 jinhezhe@hanmail.net

2. 1949~1965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朝鲜文学翻译

2.1 1949~1965年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和冷战意识形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集权社会。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主题是“保卫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左倾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社会文化里充满斗争意识，对内搞反右和阶级斗争；对外团结以朝鲜、阿尔巴尼亚、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对抗以美国、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关系恶化后，又开始批判修正主义。因此，五、六十年代主导中国社会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即由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反修、阶级斗争、改造知识分子等等概念的集合，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保卫社会主义”，换句话说，是一种典型的准战争状态。

在这种冷战意识形态笼罩下的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地改造文艺界，逐步形成了极权主义文化控制的文艺思潮，这种以左倾文艺思想为主流的文化极权统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一元论的进步观，即相信只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才是历史发展中唯一的进步规律；（2）个人意识形态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高度统一；（3）集体主义至上，贬低个人和个性，甚至以政治化的伦理道德观念压抑人性；（4）意识形态的高度单一化和教条主义，造成思想和文化的保守封闭，排斥和扼杀异质文化。这种极权文化最终导致了对中国文化的彻底革命——文化大革命。

因此，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文艺思想具有典型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政治意识形态与文艺思想的合谋，发端于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变革中，在50年代基本形成了稳定的思想体系。文学艺术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口号成为主导文学艺术活动的最高原则。这种单一性极权文化反过来作用于文艺领域，文学观念、文学形态、话语思维以及创作方法与美学原则等无不体现着单一性政治文化的内在制约。这种制约强制形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突出集体主义压制个人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塑造典型人物”等等美学标准和创作潮流，导致了文艺作品形式和内容的单调和“假、大、空”，在精神上对人的基本欲望进行压抑甚至扼杀，甚至造成人文主义的倒退。五、六十年代产生的文学作品，大都是以贴近这种主流意识形态为特征的。

2.2 1949~1965年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作为一种文学活动当然也不例外。1950年开始,中国的文学翻译活动中最大的特点就是由政府干预和控制翻译出版活动,而且越来越有组织有计划,“改变了20世纪上半期由译者和出版社来决定翻译选择的现象。”¹⁾另一个特点可以说是翻译活动得到了重视,1951年11月由中国出版总署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1954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在出版方面,1949年9月创刊了《翻译月刊》,1950年7月又创刊了《翻译通讯》,针对文学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展开了批评活动。1953年7月由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办的《译文》创刊,是一份专门介绍世界文学的期刊,茅盾出任主编。这份期刊是为了纪念当年鲁迅创办的《译文》并继承《译文》的精神。茅盾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上阐明了《译文》的编辑方针:介绍“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秀文学作品”以及“外国的古典文学和今天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学。”1959年,《译文》更名为《世界文学》。1965年《世界文学》被指令停刊整顿一年,1966年2月复刊仅出一期,就因遭遇文化大革命而被迫停刊,直到1977年10月以“内部发行”形式复刊,1978年10月才恢复公开出版。在出版方面,与20世纪上半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的民营出版社被公私合并,著名的大出版机构也停止出版翻译文学作品,中国政府把出版翻译作品的活动都纳入国营出版机构,使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出版活动,而且可以控制对外国文学翻译的选题和出版。

50年代前半期,中国一度掀起了翻译外国文学的高潮,据《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统计,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间,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达5356种,比整个20世纪上半期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多出一倍以上。在外国文学翻译的选择上,新中国建国后曾一度把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苏联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翻译放在首位,也就是提倡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们学习苏联作家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苏联的文学理论成为指导中国作家创作的标准。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翻译事件是翻译高尔基的小说及理论著作,以及绥拉菲维奇的《铁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法捷耶夫的《毁灭》、《青年近卫军》,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等等。而欧美作家主要局限在马克·吐

1) 查明建 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M], P557,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7, 武

温、杰克·伦敦、德莱塞、马尔滋、法斯特等几位因批判现实而被认为是进步的作家。1957年以前，中国主要关注苏联和欧美文学，50年末开始对亚非拉“小国”文学表现出了关心，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印度、埃及、约旦、阿根廷、古巴、南非等国家的文学作品被译介进来，但是数量不多，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作品输出国的发展中的文学不能提供更多优秀作品，另一方面跟小语种翻译队伍的不足有关。进入60年代，随着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对欧美和苏联文学的抵制，朝鲜和越南等国的文学成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翻译对象。

2.3 1949~1965年朝鲜文学中译

这一时期译介的朝鲜小说家主要有李箕永、韩雪野、崔曙海、千世峰、黄健、朴雄杰、李根荣、尹世重等人，译介的诗人有赵基天、朴世永、朴八阳、崔荣化、闵丙均、洪淳哲、韩明泉等人，译介的剧作家有宋影、赵白岭、金载浩、池在龙、金衡等人。

这一时期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代表性期刊《世界文学》，从1959年《世界文学》首刊至1964年文革前，至少刊登了30篇（首）以上的朝鲜文学作品，也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韩国语翻译家。下表是笔者搜集整理的《世界文学》朝鲜作品目录。

发表时间	作品标题	体裁	作者名	译者名
1959. 5	小工程师的错误	短篇小说	姜孝顺	冰蔚
1959. 9	大陆的母亲	诗	金北原	冰蔚
1959.12	党啊，我们有颗你给的心	诗	金学渊	金中狱
1960. 3	初雪	短篇小说	边熙根	碧侠
1960. 3	革命的道路	短篇小说	李尹英	谭静、张庭延
1960. 4	竞赛	短篇小说	石尹基	张庭延、谭静
1960. 5	我通宵不眠	诗	郑文香	紫荆
1960. 6	高举起斗争的旗帜前进	诗	韩明泉	周心忠
1960. 7	工地夜话	短篇小说	李甲基	冰蔚
1960. 7	爷儿俩	中篇小说	金北乡	
1960. 7	大同江的早晨	诗	朴八阳	越琴

1960. 7	在桥上	诗	金常午	陶生
1962. 7	百日红	剧本	权正雄	陈文琴
1962.10	诗词三首《饥民诗》《龙山史》《满江红》	诗	丁荣三	
1962.10	旅洗剑亭记(选自丁若镛诗集)	古典诗	丁荣三	
1963. 1	王大妈	短篇小说	李永圭	陈文琴
1963. 7	旅伴	短篇小说	金秉勋	陈文琴
1964. 1	幸福	短篇小说	石润基	陈文琴
1964. 1	红霞映照的地方	短篇小说	金秉勋	陈文琴
1964. 1	自豪	短篇小说	金秉勋	周有光
1964. 1	走正步	短篇小说	郑昌允	小晓
1964. 1	春天来到了	短篇小说	权正雄	小晓
1964. 1	千里马呀, 朝鲜的象征	诗	崔荣化	韩昌熙
1964. 1	夜车的汽笛	诗	元镇宽	冰心
1964. 1	寄情溪川	诗	朴散云	冰心
1964. 1	你虽然静立着	诗	郑文乡	冰心
1964. 1	祖国	诗	郑曙村	张琳
1964. 7	宣言	诗	吴永载	张琳
1964. 8	鱼群流向大江	小说	陈载焕	白光华
1964. 9	我们永远在同一条道上前进	诗	金学渊	小晓

从这份目录可以发现,所选译的作品大多是歌颂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描写普通人民的战斗和工作,塑造英雄主义式的人物形象的作品,特别是充满激情的诗歌体裁尤其突出,体现出了译者在作品选择上的倾向性,即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保卫/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主题服务。

从单行本看,50年代初期译介的朝鲜作家作品,有两个特点:一是仍然有不少是第三语种译本转译到中国的现象。例如,50年代最早出版的朝鲜作家作品——赵基天的长诗《白头山》(大众书店,1950年),是俄国文学翻译家余振²⁾根据俄文译本转译成汉语的。1953年,适夷³⁾根据日译本《白头山》转译成汉语,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时,增收

2) 余振:本李毓 190. 1996, 俄国文学翻译家

3) 适夷本楼适夷1905. 1. 3-2001. 4. 2) 俄罗斯、日本文学翻译家

了一篇长诗《战斗的丽水》。1950年上海永祥印书馆再版了张赫宙的散文集《朝鲜风景》（范泉译本）。二是反映朝鲜人民战斗生活的报告文学类作品比较多。

1951年出版了《朝鲜在战斗—朝鲜诗选》（赵基天 等/原著，韦旭升 等/译）、《朝鲜卫国诗选》（黎风/编辑），出版了四部报告文学：赵正哲的《朝鲜游击队的女儿》（崔民秀/译），金史良的《同志们，看见海了》（李烈/译），金史良等的报告文学《英勇战斗的朝鲜人民》（金波/译），还有同一译者的报告文学《中朝人民英雄的故事》等作品。1952年出版了报告文学《为祖国而战的朝鲜青年》（朝鲜民主青年同盟/编，冰尉⁴/译）、《朝鲜少年近卫队》（朴根淑等/口述，杨汉泉据俄文版转译），还有金史良的儿童文学《队伍向着太阳》（李烈/译），洪淳哲的《光荣归于你们—访华诗抄》（陶炳蔚/译）。此外，还有金学铁的长篇小说《泛滥》和报告文学《军功章》（孙振侠/译），不过金学铁一直居住在中国，他的创作应当属于中国的朝鲜族文学。此外还有刘华云翻译苏联作家金罗曼（Ким Роман）的长篇小说《在顺川发现的一本日记》，也不能归入朝鲜作家作品。

195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李园友的小说《盼望的一天》（冰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韩雪野的短篇小说集《离别》（李烈/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朝鲜小说集《燃烧的月尾岛》（柳树人/译），收入“黄健/燃烧的月尾岛、他回来的路；韩奉造/母亲；金万善/猎人；姜亨求/临津江”等作品。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了李烈编译的小说集《高贵的人们》，收入李泰俊等作家的作品。上海文光书店出版了赵灵出、韩凤植的独幕话剧《战友》。这一时期还出版了3部朝鲜民间故事，萧雨编选的民间故事选《人参的故事》（上海广益书局）、天津通俗出版社的《朝鲜民间故事》（米哈依洛夫斯 等/编选，周彤/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朝鲜民间故事》（恩·霍兹/编，丰子恺、丰子吟/译）。

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两部诗集，分别是赵基天的长诗《生之歌》（李烈/译）、朴世永诗选《战友之歌》（尹成勇/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了韩雪野的长篇小说《大同江》（金波/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洪建的剧本《一二一—高地——伤心岭》（朝鲜文化宣传省对外文化联络局/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接连出版了辛垣译自俄文本的《朝鲜民间故事》（恩·霍兹/编写）、《朝鲜民间故事续集》（加陵-米海

4) 冰尉：本名陶炳男，汉族，1930年5月平壤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山东省译著有《春香传》等20余部。

洛夫斯基 等/编写)；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了金丝、倩君根据英文版翻译的《朝鲜民间故事》。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另外编辑出版的连环画册《朝鲜人民军英雄故事》(2册)，属于编写，不应划入翻译作品里。

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韩雪野的长篇小说《大同江》李烈译本。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韩雪野小说选集《在轨道上》(柳树人/译)，收入8篇小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火线》(黄健/等著，张禄林/等译)。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闵丙均的诗集《朝鲜的歌》(冰蔚/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童话选集《不老草》(元道弘/等著，李烈/译)。

1956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李箕永长篇小说《故乡》(李根全、关山/译)。青年出版社同年1月出版了李箕永的《江岸村》(蔡志清/译)。作家出版社连续推出了洪淳哲长诗《阿妈妮》(冰蔚/译)、韩成的剧本《等着我们吧！》(冰蔚/译)、古典名著《春香传》(冰蔚、张友鸾/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一年同步推出了冰蔚与木弟合译古典名著《春香传》。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由推出了朴八阳的长篇叙事诗《黄海之歌》(王文光/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姜孝顺的儿童故事集《再也不能那样了》(冰蔚/译，刘熊/画)。

长篇小说《故乡》作为李箕永的代表作之一，深入细致地再现了二、三十年代朝鲜的社会现实，描写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冲突，同时侧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人民的残酷压迫和掠夺，是解放前朝鲜进步文学中最优秀的一部作品。小说以1930年前后的元德村为背景，描写了当地农民在革命知识分子金喜俊的带领下，反抗地主的残酷剥削的斗争，同时穿插描写了在日本人经营的纱厂中，工人们为支援农民的抗租斗争而举行的同情罢工和义务捐助。李箕永在中译本的序言《给故乡的读者》中写道，“元德村农民们反抗地主恶毒榨取的斗争是故乡的基本梗概”。《故乡》作为朝鲜文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最初尝试，在朝鲜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塑造出具有革命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金喜俊的形象。《故乡》的艺术成就也在于通过气势恢宏的描写，勾画出一幅幅朝鲜农村的风俗画，散发出浓烈的乡土气息，而且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性格鲜明。

1957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土地》(冰蔚/译)和韩雪野的长篇历史小说《历史》(李烈/译)，同时推出了柳基鸿、徐万一根据韩雪野的小说《狼》改编的剧本《狼》(白锐/译)。这一年出版了2部剧本，一本是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渔轮前进号》(金衡/原著，冰蔚/译)，一本是中国电影出版社推出的《游击队姑

娘》(金承九/原著,沈圣英、丁尔纲/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还推出了李园友的故事集《斧头将军》(李烈/译)。河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朝鲜童话选《淹死在池塘里的狐狸》(李子应等/原著,[朝]马超群、孙基平/译)。

1958年出版的朝鲜文学作品虽然不多,但都是经典名作,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连续推出了韩雪野的小说集《狼》(译者不详),朴八阳的《朴八阳诗选》(张琳/译),赵基天的《赵基天诗集》(适夷、白锐等/译)。其中《赵基天诗集》是从日文版转译,除长篇叙事诗《白头山》和《生之歌》外,还收入了《献给斯大林元帅》、《图门江》等28首抒情诗。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了金永植的儿童文学《狼牙草》(吴宽模/译)。

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继续推出了朝鲜文学的代表作品,有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土地》(冰蔚/译)、崔曙海的《崔曙海小说集》(李圭海/译)、朴世永的诗选集《不死鸟》(韦旭升/译)、韩明泉的长诗《北间岛》(冰蔚/译),以及李烈、田本进合译的全译本《大同江》。韩雪野的《大同江》于1952年第一部发表后,出现了两种中译本: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金波译本,128页;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李烈译本,120页。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大同江》全译本。上海文艺出版社也推出了两部小说,韩雪野的长篇小说《黄昏》(武超、蔡志清、许文湖/合译)和千世峰的中篇《战斗的村民》(李英爱/译)。中国戏剧出版社还推出了朝鲜传统歌剧《沈清传》(金亚夫/改编,梅峰/译)。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了由庄志改编的《春香传》评剧,收入中国评剧院编辑的《评剧大观》第8集(宝文堂书店),虽然这是改写朝鲜文学作品,而不是翻译作品,但是通过这种改写和再创作现象,可以看出《春香传》在当时已经成为广为中国读者熟知的朝鲜古典文学作品的代表。

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继续推出两部优秀译作,黄健的长篇小说《盖马高原》(冰蔚/译)和《朝鲜现代短篇小说集》(韩雪野等/著,冰蔚等/译)。《朝鲜现代短篇小说集》共收录24篇短篇小说:《过渡期》、《摔跤》(韩雪野)、《造纸厂村》(李箕永)、《石工组合代表》(宋影)、《洛东江》(赵明熙)、《出走记》(崔曙海)、《氮肥工厂》(李北鸣)、《被水冲毁的村庄》(严兴奭),以上为北大朝语专业学生翻译;《开天辟地》(李箕永)、《劳动一家》(李北鸣),以上为许保裕译。《革命的道路》(李润永/著,谭静、张庭延/译)、《燃烧着的岛》(黄健/著,张禄林/译)、《特等电话员》(朴雄杰/著,蔡志清/译)、《初雪》(边熙根/著,碧侠/

译)、《命令》(李钟烈/著)、《工地夜话》(李甲基/著)、《父亲和儿子》(金北乡/著,冰蔚等/译)、《竞赛》(郑润基/著,李佩伦等/译)、《孤儿》(姜亨九/著,张琳/译)、《更高地举起斗争的旗帜》(李箕永/著,紫荆/译)、《大同江的早晨》(朴八阳/著,越勒/译)、《千里马骑士》(李晓云/著,越勒/译)、《在桥上》(金常午/著,陶生/译)、《爷儿俩》(金北乡/著,冰蔚/译)。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韩雪野长篇小说《塔》(冰蔚/译)和权正龙的《父亲的控诉》(何文/译)。中国戏剧出版社推出了宋影的话剧《不死鸟》(金圣哲/译)。

196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李根荣的长篇小说《第一次收获》(江森⁵⁾/译)。

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朝鲜现代戏剧集》上下册(宋影等/著,冰蔚、田桂文、沈仪琳等/译),收录有《爱国者》、《不能再过那种日子》、《我们一直在战斗》、《渔轮前进号》、《等着我们吧》、《侦察兵》、《伟大的力量》、《先驱者》、《以人民的名义》等。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为《朝鲜现代戏剧集》。上海文艺于当年5月又推出了庄志改编的《越剧 春香传》。中国戏剧出版社则推出了赵白岭的《红色宣传员》(张琳/译)。

196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千世峰长篇小说《白云缭绕的大地》(冰蔚、沈圣英、文公/译)和朴雄杰的长篇小说《祖国》(江森/译),还推出了赵白岭的戏剧剧本《红色宣传员》。中国电影出版社也推出了《红色宣传员》的电影剧本(紫荆/译)。商务印书馆则出版了金河明的传记文学《燕岩朴趾源》(陈文琴/译)。

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张琳翻译的《红色宣传员》,这部作品的反复出版,可以发现主流意识形态想要建构翻译文学经典的意图。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重新出版了四部重要作品:李根荣的长篇小说《第一次收获》(江森/译)、千世峰的中篇《战斗的村民》(李英爱/译)、李箕永的长篇小说《故乡》(李根全、关山/译)、朴赫的剧本《朝鲜的母亲》(江森/译)。北京作家出版社同年推出了尹世重的长篇小说《在考验中》(吉文涛、金圣哲、江森/译)、郑成勋的中篇《回声》(田华麟/译)、李东春的话剧《回声》(周必忠/译)。中国电影出版社推出了五部朝鲜剧本:权正雄的《百日红》(崔奉春、崔承一/译)、李智勇的《分界线上的乡村》(甘章贞/译)、金承九的《在敦化的密林里》(一宏、忍坚等/译)、韩尚云的《海鸥号船员》(韩昌熙/译)、

5) 江森,高宗文的笔名

李鍾淳的《红色花朵》（紫荆/译）。其中《故乡》于1978年由上海译文重出新一版，《在考验中》于1981年由上海译文重出新一版，《回声》于1978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重出新一版。

1965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五本朝鲜作品，朴世永的长诗《密林的历史》（李佩伦、杨永骝/译），崔荣化的诗集《火炬》（张琳/译），朴灵宝的长诗《朝霞》（鲁定⁶⁾ /译），池在龙、金衡的剧本《青春的舞台》（齐岱/译），杨载春、金昌海等创作的报告文学集的《千里马时代的史诗》（沈仪琳/等译）。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则出版了宋影剧作选《江华岛》（王文光/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李镇华的儿童文学《鸟儿栖息在柳树沟》（洪浩/译）。

从上述整理可以看出，这一时间译介到中国的朝鲜文学作品的主题和内容，主要有：1) 歌颂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2) 描写改造个人思想及转变过程，如《红色宣传员》；3) 描写光复前日本帝国主义对韩半岛的压迫和剥削，歌颂朝鲜人民抗日斗争的英勇事迹；4) 歌颂领袖金日成；5) 歌颂韩国战争期间朝鲜军人及普通百姓的战斗生活。作品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塑造英雄主义式的典型形象。作品体裁主要以小说、诗歌、戏剧、报告文学为主。译介翻译这类作品的目的，主要是：1) 作为中国宣传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资料；2) 配合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式，宣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造下个人的思想觉悟；3) 翻译反映以“千里马运动”为代表的朝鲜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斗争生活的作品，配合为中国的“大跃进”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热潮；4) 翻译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的文学，促进社会主义阵营的友好往来。

这一时期的朝鲜文学翻译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出现了一批高素质朝鲜语翻译家，不少翻译作品的质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大部分作品侧重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但是为中国人了解朝鲜和朝鲜文学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

2.4 这一时期活跃的朝鲜文学翻译家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翻译态度严谨、翻译水平很高的朝鲜语翻译家，如高宗文、陶

6) 定：张永生的笔名

炳蔚、张永生、韦旭升、李烈、田华麟、王文光、沈仪琳等的翻译活动非常活跃，这里只介绍其中四位翻译数量较多，而且在当时和后来产生了一定影响的翻译家。

高宗文：1935年生于江苏镇江，汉族，曾用笔名江森、高贷、高岫、枚芝、为卫等。1957年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科毕业，先后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担任编辑，曾被中国外交部借调到朝鲜外国文出版社金日成著作选集中文版校对组工作，1989年获得过朝鲜二级友谊勋章。1959年开始发表译作，翻译了姜敬爱的长篇小说《人间问题》，以及《祖国》、《第一次收获》、《在考验中》、《雾中的山冈》、戏剧《朝鲜的母亲》、《宋影戏剧集》、《朝鲜歌曲集》、电影电视剧《第十四个冬春》、《郡委书记》、《月尾岛》、《两个船长》、《安重根枪击伊藤博文》等20多部，七十年代末开始翻译韩国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三代》、《汉城梦幻》、《荒地的早晨》、《蔷薇夫人》、《心中有个恋人》、《人的儿子》，小说集《深夜的拥抱》、《通俗谐谑小说集》、短篇小说《黄土地》、《中央线火车》、《船歌》，以及《韩国民族的起源和文化》、《韩国经济的国际化及其发展》等译著，共计40余部，约500万字。高宗文的译文优美，如同直接用中文创作般流畅，体现出了译者高超的文学写作功夫。

陶炳蔚：笔名冰蔚，汉族，山东省人，1930年5月出生于朝鲜平壤。先后就读于华侨学校、日本中学、金日成大学，1950-1973年在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工作，1973年到研究所任亚太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朝鲜、日本问题，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朝鲜文学翻译界权威之一，译作有古典小说《春香传》，长篇小说《盖马高原》、《塔》、《再也不那样了》、《不能再过那种日子》，长诗和诗集《阿妈妮》、《北间岛》、《朝鲜的歌》、《光荣归于你们》，报告文学《为祖国而战的朝鲜青年》，剧本《等着我们吧！》，合译有《朝鲜现代短篇小说集》、《白云缭绕的大地》、《千世峰小说集》、《土地》、剧本《渔轮前进号》、《朝鲜现代戏剧集》等。

张永生：1931年生，山东定陶人，汉族。曾用笔名：张琳、鲁定、齐岱、文公。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专业。1949年起历任济南华东大学、山东大学中文系学员，天津第四十四中学语文教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编辑。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著《朴八阳诗选》（[朝鲜]朴八阳/著）、《朝鲜现代短篇小说集》（合译），诗集《火炬》（[朝鲜]崔荣化/著），剧本《青春的舞台》（[朝鲜]池在龙/著），长诗《朝霞》（[朝鲜]崔灵宝/著）、《红色宣传

员) ([朝鲜] 赵白岭/著), 中篇小说《白云缭绕的大地》([朝鲜] 千世峰/著, 合译)、《朝鲜短篇小说集》(合译), 长诗《白头山》([朝鲜] 赵基天/著)、《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朝鲜卷》(合译), 长篇小说《圣火》([韩国] 安东民/著)等。

韦旭升: 1928年10月23日生于江苏省南京市, 汉族, 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朝鲜语专业, 曾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亚非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主要从事朝(韩)古典文学及韩语语法研究。出版专著有《朝鲜文学史》以及韩国学研究专集《韦旭升文集》(6卷本, 2000年)等。译著有朝鲜诗集《不死鸟》、古典名著《九云梦》、《抗倭演义(壬辰录)》、《玉楼梦》和《鹭山时调选集》, 短篇《红辫绳》等。2005年10月9日获得韩国总统授予的宝冠文科勋章。

2.5 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制约

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翻译的重点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纵观这一时期的朝鲜(韩国)文学翻译, 从作品的选择上就可以发现浓厚的政治色彩, 即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朝鲜文学作品被大量译介进来, 而处于冷战对方的韩国文学, 却基本没有译介。随着五十年代末中国和苏联关系恶化, 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文学成为译介的重点。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 只有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种族歧视、剥削、犯罪等社会黑暗面的文学, 才被认为是进步的、值得译介的作品。以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为标准来选择作品, 必然导致在作品选择上首先强调思想内容符合时代主题, 其次注重原作者的身份和立场, 而把作品的艺术性即诗学放在末位, 而且突出的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准绳衡量一切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换句话说,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操纵文学创作及文学翻译活动的重要的权力话语。在内容上, 英雄叙事成为文学重要的政治任务, 塑造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英雄人物和典型形象的作品, 因为符合中国的时代主题而被大量译介进来。

抗日战争题材仍然是五、六十年代中国译介朝鲜文学的重要线索。赵基天(1913—1951)的英雄史诗《白头山》是诗人的代表作, 在朝鲜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部长达 1648行的长篇叙事诗, 描写了金日成领导的朝鲜抗日游击队在长白山地

区全歼日寇讨伐队，并突破日寇鸭绿江防线，袭击日本警备要塞——H 镇的故事。全诗由序诗、七章正诗和尾诗3部分组成。序诗中写道：

当朝鲜的命运走上了绝境，
有多少万爱国志士摸索着黑路，
投身到白头山的密林？
是谁，渴慕着枯叶丛中的睡眠，
出入死境像出入家门？
山啊，祖先的山呵，说吧，
在解放了的土地上，
谁在为人民而战斗？
谁站在民战的最前头？

这首诗在爱国主义的主旋律下，歌颂了朝鲜抗日武装浴血奋战的史实，而且在朝鲜文学史上第一次塑造了革命领袖的英雄形象，因此这首长诗被多次译介到中国就不奇怪了。早在1950年就出版了余振译自俄文版的《白头山》，1953年又出版了适夷译自日文版的《白头山》，1958年出版的《赵基天诗集》再次收录了适夷译自日文版的《白头山》；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张琳译自韩文版的《白头山》；甚至到了1992年，这首长诗跟话剧《血海》一起收录重庆出版社编辑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朝鲜卷》里。

此外，赵明熙（1892-1942）的短篇小说《洛东江》塑造了有革命理想的英雄形象；李相和（1901-1943）的诗篇《春天也会来到被掠夺的田野吗？》则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新倾向派”代表作家之一的崔曙梅（1901-1932）在他的早期短篇小说《出走记》里，深刻地暴露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朝鲜人民的苦难，以及他们对民族敌人的刻骨仇恨。

反映韩半岛南北战争和反美战争题材，也成为控制翻译活动的国家权力重点选择的翻译对象。赵基天创作的诗歌《朝鲜在战斗》在1951年就被译介到中国。千世峰的中篇小说《战斗的村民》和《白云缭绕的大地》、黄健的《燃烧着的岛》、边熙根的《初雪》等，都很快通过翻译家的译笔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千世峰（1915-？）曾获1954年朝鲜文学艺术奖的中篇《战斗的村民》中，以美军占领下的内江村一带为背景，描写

了农民游击队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黄健(1918-?)的小说《燃烧着的岛》(又译《燃烧的月尾岛》),塑造了守卫月尾岛的海防炮兵连长李大勋、女报务员金明姬等英雄人物和他们一直战斗到牺牲的场面。宋影的《江华岛》是戏剧文学中这类题材的代表作品。

塑造以“千里马运动”为代表的朝鲜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热潮里,各行各业涌现出的劳动者英雄人物形象的作品,也跟这一时期中国的时代主题相符,因此成为译介的另一个重点。尹世重的长篇小说《在考验中》描写了工人阶级在恢复和建设朝鲜工业重点——炼铁厂的过程中,克服重重困难忘我劳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故事。李根荣的中篇小说《第一次收获》描写了经历韩半岛战争后,北部农村地区的社会主义式改造和经济上的农业合作社制度。

根据翻译文化学派的观点,翻译是一种文化操纵(cultural manipulation),译入语文化对文学翻译同样有着制约和利用的性质,特别是意识形态通过控制作品的选择和翻译出版活动,有意图的构筑符合其政治思想需求或标准的翻译文学库,并利用这种手段使之经典化,最大限度地实现意识形态控制文学翻译的目的。也就是建立特定语境下的翻译文学经典,引导文艺创作的潮流,达到政治宣传效果。而建立翻译文学经典,就不得不考虑作品的诗学价值了,而这一时期的诗学本身,就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审美标准之上,所以诗学本身被罩上了深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笔者借用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的话解释这一现象:“体制总是强化或试图强化某一时期的主流诗学,其方式就是将这种主流诗学作为当下创作的衡量标准。因此,某些文学作品在出版后不长的时间内会被提升为‘经典’,而别的产品就遭到拒绝。”⁷⁾

赵白岭的话剧《红色宣传员》同中国创作于60年代的《红色娘子军》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剧情讲的是平壤郊区某农业合作社的宣传员李善子,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帮助和带动落后社员,耐心细致地做改造人的工作,调动了作业班全体组员的积极性,使一个生产落后的作业班面貌为之改变,一跃而成为思想、生产双丰收的先进单位,获得了“千里马作业班”的称号。话剧和电影《红色宣传员》在中国六十年代,

7) AndrLefever, Translation, Rewriting&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London:Rout-Ledge, 1992), P. 19. 转引自查明建《文化操纵与利用: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J,《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2期(总第55期), P96

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其影响一点不低於《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这跟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权力，有意识地把《红色宣传员》等作品推向中国文艺界的中心地位，从而建立以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建设为内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形式的经典形式库，从而引导和操纵中国艺术家们的文艺创作。为此，中国方面不仅引进朝鲜话剧团在国内巡回公演，还上映了朝鲜制作的电影《红色宣传员》。不仅如此，1963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了中国版的《红色宣传员》，由当时的国务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演进，朝鲜艺术团也派人到北京指导排演⁸⁾；1964年中国方面又重新拍摄了中国版的《红色宣传员》，片名《李善子》取自主人公的名字，王炼编剧，郑君里导演，张瑞芳等主演。此外，还有严凤英主演的黄梅戏《红色宣传员》等其它形式的改编和演出。中国戏剧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分别出版了话剧《红色宣传员》，中国电影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了电影剧本《红色宣传员》；196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梅阡改编的评剧《红色宣传员》；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连环画《红色宣传员》；2005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再次出版了连环画《红色宣传员》(李大发/改编，盛亮贤 沈悌如/绘画)。这部作品不仅在中国翻译出版和公演，而且生产了中国版和其它艺术形式的作品，证明了这部朝鲜作品对中国作家们的创作活动，也产生了直接和巨大的影响。

另一部在中国被经典化的作品是古典作品《春香传》。这部最早在18世纪形成文字的古典小说，在中国也因意识形态的操纵而流传甚广，成为翻译经典形式库中的动态经典，并产生了大量其它形式的文艺作品。原作的大致情节是：端午节的时候，南原府使李翰林之子李梦龙和艺妓月梅之女春香在广寒楼相遇，并且私订终身。但是尊卑贵贱、等级分明的封建社会不允许贵族和艺妓之女结合，李梦龙在父亲调任时忍痛告别春香，随父亲进京。新任府使卞学道倚仗权势要纳春香为侍妾，遭到拒绝后将春香抓进监牢施刑，还将她定成死罪。考中状元的李梦龙以暗行御使身分来到南原，救出春香，严惩卞学道，有情人终成眷属。本来这部作品应当是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经典，但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赋予了反封建、阶段斗争的思想内涵，使这部作品成为揭露封建社会的剥削压迫和阶级仇恨的文学作品。男主人公李梦龙所写七言诗：“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也突出强调了这种思想倾向。1954年，朝鲜作家同盟出版社以《烈女春香守节歌》为底本进行整理修订出版，题名《春香传》，后来

8) 参考张庭延的回忆总理给我夹家乡菜吃[N-1, 世界网报2008年03月05]

改编成唱剧、话剧演出，两次拍成电影上映。中国在关《春香传》的戏曲再创作，大多根据朝鲜国立古典艺术剧场的演出版本进行移植，而且京剧、评剧、越剧三大剧种都排演了《春香传》。1956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冰蔚（陶炳蔚）和张友鸾合译的《春香传》，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推出了署名冰蔚、木弟翻译的《春香传》。1959年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了庄志改编的《春香传 评剧》。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庄志改编的《春香传 越剧》。2006年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又推出了〔韩〕柳应九翻译的小说版《春香传》。此外80年代还有辽宁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 春香传》等其它形式的出版物。

另一部被经典化了的作品《卖花姑娘》，被誉为朝鲜五大经典革命歌剧之一。据说这部作品是金日成于1930年在中国东北地区亲自创作的。内容是主人公花妮一家为了还清w从地主家借来的两斗小米，爸爸、妈妈、儿子、女儿不得不代代在地主家当长工的悲惨生活，描写了在日帝霸占下多灾多难的民族命运。《卖花姑娘》成功之处是把泪水浸透的“孝心花篮”转变为鼓动抗争的“革命花篮”。最早介绍到中国的电影版《卖花姑娘》，曾在中国引起前所未有的轰动效果，主题曲“卖花姑娘”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这部电影于1972年由金正日亲自长工改编成电影，1972年舛灾多长春电影制片厂就着手翻译这部电影，女作家何鸣雁担任了翻译任务。早在1958年何鸣雁曾因用七律翻译朝鲜电影《春香传》而赢得过广泛声誉。《卖花姑娘》的主人公“花粉”如果直译过来，在汉语里感觉不妥，何鸣雁联想到中国人对小姑娘的爱称“妮”，把“把”转变为鼓动改为“花妮”，得到译制组的称赞。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歌剧《卖花姑娘》，这部译本是根据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1，1971的中译本，对照原文修改个别字句后1971。歌剧《卖花姑娘》曾三次在中国为鼓动1930年最早在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当天，在中国东北地区一个叫五家子的地方一所学校礼堂首演；1971，1在北京、上海等地巡回演出40多天；1998年在北京、上海等十几个城市巡回演出；甚至到了2008年，朝鲜血海歌剧团于4月）的携大型歌剧《卖花姑娘》，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公演，VIP票价达到了880元人民币，说明中国人对这部作品的喜爱，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由此可以看出意识形态操纵文化的深度和持续性有多么深远。

3. 1966~1978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朝鲜文学翻译

3.1 1966~1978年中国社会和意识形态

中国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历了数次重大的挫折,例如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极左思想占据绝对主流地位;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以庐山会议为契机在全国开展的“反右倾”斗争;1959至1961年的三年经济困难。1966年至1976年在全国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将社会危机推向了高潮。“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为前提,极端专制的意识形态借助政治体制对社会舆论、文化艺术等领域实施了政治化,文学艺术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整个社会文化被严重扭曲。“保卫社会主义”的准战争意识形态发展到了极致,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也导致文化艺术的严重倒退。以期刊为例,文化大革命前全国有200种以上的期刊,而1969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正式登记的刊物仅剩21种,“成为近百年期刊史上年度出版种数最低点。”⁹⁾ 翻译类期刊也难幸免,译介外国文学的主要刊物《世界文学》和北京的《翻译通报》、上海的《翻译》都被迫停刊,只剩一家1973年11月在上海创刊的内部发行刊物《摘译》,另有一些零星译文,发表在上海的《朝霞》杂志。

3.2 1966~1978年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

五十年代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掀起了一个高潮后,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出现颓势,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动荡和文化专制时期,文学被极端的意识形态化,文学界和出版界也陷入一切沉寂,期刊纷纷停刊整顿,公开出版物急剧减少,许多书都变成只有少数上层公务员才能看到的“内部出版”。外国文学翻译在这一时期陷入极度的萧条期,很多著名翻译家遭到打击和压迫,不得不停下手中的译笔。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暴发到1971年11月间,五年多的时间里全中国竟然没有出版一部外国

9) 马士奎《文革期间的外国文学翻译》[J],《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P6

文学作品。直到文革后期开始，虽然逐渐恢复出版，但是多以内部出版物为主，而且很多都是文革前翻译的作品的再版。文革期间的出版物，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为公开出版物，一种为内部出版物。据有关资料统计，文革时期公开出版的外国文学译作有三十四种¹⁰⁾，而且包括从前已经出版过的重印本。而且公开出版物的译介对象，主要是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民族主义国家的作品，如朝鲜、越南、老挝、莫桑比克、巴勒斯坦、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的作品，内容主要是反抗美国、民族解放、独立运动、社会主义建设、阶级矛盾等等。

发行内部出版物的现象始于五十年代末，主要是为了译介不符合中国意识形态或政治标准的外国著作，作为批斗的“反面教材”。内部出版物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哲学理论作者，以走上“修正主义路线”的苏联理论著作翻译的最多，其次是西方理论家的著作。例如德国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苏联考茨基的《社会主义对抗共产主义》和《陷于绝境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这些政治、哲学著作有一段时间在出版时使用了灰色封皮，因而被称为“灰皮书”。而外国文学作品在内部出版时，多用黄色封皮，因而被称为“黄皮书”或者“白皮书”。这些“内部出版物”虽然控制发行范围和读者群，而且购书时需要提供“购书证”或“介绍信”，但是除少数理论著作把读者范围严格控制在少数高层干部和专家外，大多数都通过各种方式在一般读者中得到了传阅，特别是文学类内部出版物流传的范围更广，对文革时期的青年一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为文革后期中国知识人的觉醒和80年代的启蒙思想运动，提供了火种。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外国文学作品，主要有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和《解冻》、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还有一些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如萨特的《厌恶》、加缪的《局外人》等等。

诗人萧萧在《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¹¹⁾一文里回忆：“不少‘文革’前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读物’也流落到他们的子女及一般青年学生手里。他们面对破碎的世界，在这些书中寻找完全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答案。这种人生启蒙期中的精神漫游，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代历经磨难者们难得的自由时光……这是在这一读物体系中熏陶出来的一代……由于当时的中国处于一种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皮书’便成了一代人与世界‘沟通’

10) 同上

11) 收廖亦武《沉殿：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新疆少年出版199月乌鲁木齐

的惟一有限的思想资源。”作者在这篇文章里整理了对文革时期的年轻一代知识人的思想历程产生极大影响的内部发行的外国著作目录。通过这一书目，我们可以了解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人的潜在思想动向，有助于理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新时期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背景和脉络。

中文书名	外文书名
列夫·托洛茨基，柴金如译《被背叛了的革命》1963	Leon. 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 Betrayed〉
密洛凡·德热拉斯著，陈逸译《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1963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列夫·托洛茨基著，齐干译《斯大林评传》1963	L. Trotsky /〈Stalin : an appraisal of the men and his influence〉
特加·古纳瓦达纳著，齐之思译《赫鲁晓夫主义》1963	Gunawardhana Theja /〈Khrushcheyism〉
维利科·弗拉霍维奇著，林南庆译《南共纲领和思想斗争“尖锐化”》1964	Vlahovic, V/〈Program saveza Komunista Jugoslavise I "ZAOŠTAVANJE" IDooloske Borbe〉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石人译《斯大林时代》1957	Strong, Anna Louise/〈The Stalin Era〉
尼·谢·赫鲁晓夫著，陈世玉等译《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1957	Хрущёв, НикитаСергеевич/〈Мир без оружия-мир без войны〉
拉扎尔·皮斯特腊克著，北京翻译社译《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1963	L. Pistran/〈The grand factician〉
埃德加·斯诺著，王广青等译《西行漫记》1960	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
马迪厄著，杨人纆译注《法国大革命史》1964	Кропоткин, 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La Grande revolution〉
威廉·L·夏伊勒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1965	William. L. Shir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汤因比著，曹未风译《历史研究》，1966	Arnold Joseph 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
Adam Schaff著，林波等译《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1963	Adam Schaff/〈Filozofia czeowieka〉
R·加罗蒂著，徐懋庸、陆达成译《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1965	Garaudy, Roger /〈Perspectives de l'homme Garaudy〉
哈晨·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1973；	Harry S. Truman/〈Memoirs of Harry S. Truman〉

F·A·哈耶克著《通向奴役之路》1962；	Hayek, Friedrich (August) von /《The road to serfdom》
爱伦堡著，王金陵等译《人·岁月·生活》(1-3) 1962	Ehrenburg Ilya /《Ehrenburg memoir》
爱伦堡著，沈江、钱成译《解冻》1963	Ehrenburg Ilya /《Оттепель rus》
索尔仁尼琴著，斯人译《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3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лександр /《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
让-保罗·萨特著，郑家壁译《厌恶及其他》1965	Sartre, Jean-Paul /《La nqusee》
阿尔培·加缪著，孟安译《局外人》1961	Camus, Albert /《L'etranger》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著，施咸荣译《麦田里的守望者》1963	Jerome David Salinger/《The Catcher in the Rye》
萨缪尔·贝克特著，施咸荣译《等待戈多》1965	Beckett, Samuel /《Waiting for Godot》
奥斯本著，黄雨石译《愤怒的回顾》1965	Osborne, John James/《Look Back in Anger》
杰克·克茹亚克（今译凯鲁亚克）著，石荣等译《在路上》1963	J. Jack Kerouac /《On the road》
叶甫图申科等著，苏杭等译《“娘子谷”及其他》1963	Евтушенко/《Babi yar》
瓦·阿克肖诺夫著，王平译《带星星的火车票》1963	В. Аксенов /《Звездный билет》
康·西蒙诺夫著，谢素台等译《生者与死者》1962	Симонов, Константи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Живые и мертвые》
切·格瓦拉著《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1971；	Guevara, Ernesto /《El Diario del Che en Bolivia》
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上海直属机关“五七干校”编译组编《尼克松其人其事》1972	《Nixon, Richard Milhou's Biography》
伊凡·沙米亚金著，上新“五七干校”翻译组译《多雪的冬天》1972	Иван Шамякин/《Снежные зимы》
弗·阿·柯切托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处译《落角》1973	Кочетов, В. А./《Угол падения》
弗·阿·柯切托夫著，上新“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你到底要什么？》1972	Кочетов, В. А /《Что же ты хочешь?》
维·李巴托夫著，上海外语学院俄语系译《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1973	Липатов, Виль/《Сказание о директоре пропчатове》

谢苗·巴巴耶夫斯基著, 上新“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人世间》1972	Бабаевский, Семен Петрович/〈Белый свет〉
钦吉斯·艾特马托夫著, 雷延中译《白轮船》1973	Айтматов, Чингиз/〈Белый Пароход〉
亨利·基辛格著,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选择的必要》1972	Henry Alfred Kissinger/〈Necessity for Choice Prospec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这一时期的内部出版物目录里, 唯独没有发现朝鲜和韩国的文学作品¹²⁾。

文革时期发表外国文学作品的期刊, 主要是1973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的内部刊物《摘译》, 其主要任务也是“通过文艺提示苏、美、日等国的社会思想、政治和经济状况, 为反帝反修和批判资产阶级提供材料。”这本杂志1978年改名为《外国文艺》, 并公开出版发行。

这一时期翻译文学的另一个特点, 是译者署名多以集体署名, 如“五七干校编译组”等, 而且附录的评论或前言, 也多为群众性的文艺评论组织撰写, 如《朝鲜短篇小说集》的前言, 即为“北京市大兴县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业余文学评论组”, 《朝鲜诗集》的前言, 则署名“北京维尼纶厂工人文艺评论组”。

3.3 1966~1978年朝鲜文学翻译

朝鲜文学翻译活动在这一时期也同样停滞下来。1966年只有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出版了金载浩的小说《袭击》, 而且译者署名也变为集体署名“北大朝鲜语教研室”。译者这种集体翻译并以机构名称代替译者署名的现象, 说明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对文学翻译活动的控制更趋严格, 译者个体已经从翻译著作的封面上消失了。这本《袭击》象征着中国的文学翻译活动进入了一个主流意识形态绝对极权化的阶段, 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已经徐徐拉开帷幕。

此后的1967年至1974年的八年间, 没有公开出版一本朝鲜文学作品。直到1975年文革末期才开始陆续恢复出版, 但都是再版文革前翻译的作品, 或者引进朝鲜外国文出版社的中译本, 基本上没有新的译作问世。而且直到1977年, 仍然采用了译者集体署名的特殊方式。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李尚植等原著的《朝鲜短篇小说集》, 是文

12) 笔者参阅了《1949-1986年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革时期唯一值得关注的朝鲜作品。这部小说集收录了李尚植《第五次任务》（张永生/译）、康福礼《在战斗的日子里》（张永生/译）、李甲基《歼灭》（鲁陶/译）、崔钟铉《牧场来信》（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专业70届工农兵学员/译）、金北乡《儿子》（延教/译）、李泰烈《河畔的土地》（葛振家/译）、李泽洙《父子俩》（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专业70届工农兵学员/译）、卢惠淑《毕业前夕》（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专业70届工农兵学员/译）、张东一《晚霞》（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专业70届工农兵学员/译）、黄永浩《波涛声》（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专业70届工农兵学员/译）、金炳汉《湖畔新歌》（伍浩/译）。落款署名“北京市大兴县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业余文学评论组”的“前言”中说，这部小说集“多方面地反映了朝鲜人民在保卫祖和建设祖国的不同岗位上所创造的光辉业绩，塑造了众多感人的英雄形象。”“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中朝两国人民情同手足，亲如兄弟。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用鲜血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这部《朝鲜短篇小说集》的出版，一定会受到我国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进一步增进我们对兄弟的朝鲜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了解，使我们从中获得启发和教育。”

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了崔荣化等原著的《朝鲜诗集》（延边大学朝文系72届工农兵学员/译）；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朴凤学等原著的《朝鲜电影剧本集》（延边大学朝文系72届工农兵学员/译）。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赵基天的长诗《白头山》（张琳/译），和朝鲜经典歌剧《卖花姑娘》。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重新出版了李箕永的名著《故乡》（李根全/译），以及长篇小说《血海》¹³⁾。

4.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对韩国文学的认识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不仅没有译介韩国文学作品，而且介绍或评论的文章也非常罕见。目前笔者只搜集到两篇关于韩国文学的评论文章，一篇是韩昌熙的《美帝控制下的南朝鲜文学》，发表于《世界文学》1963年第7月号。这篇文章主要翻译和介绍了朝鲜刊物上发表的两篇文学评论，一篇是李元棍发表在《劳动者》上的《南朝鲜文

13) 上海译文出版采朝1978年出版的《血海中译。平壤：朝外国文出版，1978

学的现况》，一篇是朴虎范发表在《文学新闻》上的《宣扬死亡和绝望的文学——去年南朝鲜文学现况》。韩昌熙的文章写道：“今天在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南朝鲜，进步作家的创作自由遭到蹂躏；内容反动、诲淫诲盗的、为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殖民政策服务的反动作品充斥文坛。”¹⁴⁾ 这篇文章虽然完全是以政治意识形态角度介绍当代韩国文学的概况，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介绍当代韩国文学发展概况的文章，具有不可抹杀的意义。

第二篇文章也是韩昌熙于1964年2月发表在《世界文学》(1-2月号)上的评论文章《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南朝鲜文学》。这篇文章分三个部分介绍韩国文学：第一部分，指出美帝国主义和韩国政府实施的“文化政策”是迫害进步作家、培养资产阶级御用文人，并且批判韩国文学中两股潮流，即“反共的战争文学”和“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学”；第二部分，首先批判了韩国文人朴钟华文学光燮等人提倡的“正规文学”和“纯粹文学”，并且批判了《山坡上的树林》(황순원<나무들 산비탈에 서다>争文《动物的欲望》(권태웅<우리동물의 욕망>争等歪曲社会主义国家、美化美军及朴正熙政权的作品，其次用大量笔墨批判了韩国的生存主义(即存在主义)文学，把它称为“虚无主义文学和悲观厌世文学”，并列举了《证人》(박연희<증인>)文《不信任的时代》(박경리<불신시대>)文《广场》(최인훈<광장>)文《谋反》(오상원<모반>)文《墨灰说》(현재훈<默會說>)文《绝望象咖啡》(신동문<절망을 커피처럼>)文《地丁的受难》(김문수<地丁의 受難>争文《六月的影子》(최익규<六月의 그림자>争文《约翰诗集》(장용학<요한시집>争等作品。然后以《原色图表》(홍종석<원색도표>争文《客人》(《손님>争等小说为例，批判了宣扬颓废思想和色情的自然主义潮流；第三部分，主要赞扬了韩国的“进步作家们”。所谓进步的作家，是指创作出“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反对政府镇压民主文”、“暴露韩国社会的黑暗面文学作家们。作者列举了诗歌《1960年》以及证人》(《没有主即存城》(박연희<주인 없는 도시>争文长篇小说《市民社》(김송<市民史>争文证人《岁月》(이태원<세월>争文证人《月光曲》(이범선<월광곡>争文《满鹤先生》(허지만<만학선생>)文诗《啊，我的산비》(신동문<아아 내 조국>争文诗《桥》(이인석<다리>)等作品，来例证自己的观点。作者在这篇文章粹文：“南朝鲜有民族良心、正义感的作家，正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努力正视现实，上的南朝鲜人民的迫切问题。”¹⁵⁾

14) 韩昌熙美帝控制下的南朝鲜文[J], 北京《世界文学》1963年第7月号

15) 韩昌熙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南朝鲜文[J], 北京《世界文学》1964年第1-2月

由韩昌熙撰写的两篇文章，虽然都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批判性地介绍韩国文学的发展情况，但是给当时的学者以及后来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历史资料。他所批判的那些“纯粹文学”、“存在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虽然在当时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操控下的中国文学格格不入，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却成为中国文学译介的热门作品。这一现象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和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迁，中国文学审美标准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制约和操纵

在文学翻译过程中，从作品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语言转换过程以及编辑出版等翻译活动，都受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的制约。随着这种制约和操纵的程度变化，译者的主体性问题就随之凸现出来。主流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对翻译活动的控制越严密，译者个人的地位就越低，越会丧失翻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而且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也存在自觉认同和强制认同。如果说50年代外国文学翻译高潮时期，译者大部分沉浸在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愿望里，不同程度地自觉认同了主流意识形态，那么文化大革命时期则进入一种强制认同阶段。

这种强制认同，可以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权力强制剥夺了译者的作品署名权这一基本权力；二是取消了翻译稿酬制度，译者的辛苦劳动和汗水被践踏；三是译者丧失了选择作品的权力，而沦为“翻译机器”。

5.1 从译者丧失署名权角度分析

创刊于1951年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是新中国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面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纯文学发展动态的国家级刊物，有英语和法语两种版本，国内、国外均有发行。期间发表了由叶君健、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Gladys)和美国人沙博理(Sidney Shapiro)等翻译家翻译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考察这本杂志的署名情况，就可以发现从译者署名——不署名——署名的变化过程。如上所述，

50年代的翻译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基本上带有自觉认同的色彩,而且译者的劳动得到尊重。1954年在北京召开的“国家翻译工作者大会”,还在某种程序上承认译者的主体地位和贡献。这种观念反映在《中国文学》上的证据,就是1955至1966年间发表的译作,每篇结尾都标注译者的名字。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文学》虽然还在发行,但是被迫沦落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传声筒”,不仅作品选择像人们的服装和发式一样单调统一,大多是塑造“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的作品,而且发表了许多政治性的荒唐文章。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发表的译作,都删去了译者的名字。甚至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形成的外国文学译介的又一次高潮中,《中国文学》上也极少出现译者的名字。1976年文革结束,茅盾重新出任《中国文学》主编,杨宪益担任执行编辑,直至1981年3月茅盾去世,除王蒙的小说《蝴蝶》标明译者为戴乃迭,还有老舍的小说《正红旗》标明译者为Don J. Cohn外,其他译作均隐去了译者署名。1981年至1987年杨宪益担任《中国文学》执行主编、主编和顾问期间,对《中国文学》进行了改版,使《中国文学》面貌为之一新。“自杨宪益先生主持《中国文学》后,译者之名重现译作之尾。这看似微末的变化,却透露出国内学术界对译者主体地位与独特贡献的觉醒。”¹⁶⁾

译者丧失署名权的另一个标志是集体署名和化名。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集体主义”、“典型”、“英雄”等词汇,而拒斥一切“个人”、“私人”、“个性”一类词汇的时代,这一时期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多以集体翻译为主,署名也多用翻译机构的名字,如“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专业工农兵学员”、“延边大学朝鲜语系72届工农兵学员”、“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千校翻译组”、“上海外国语学院《热的雪》翻译组”等等。“集体代替个人署名也是‘破除创作私有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淡化个人名利的一种手段。”¹⁷⁾译作署名采用化名的方式,一方面是集体翻译的译作,采用集体化名,如南开大学工农兵学员集体翻译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时,署名“南凯”;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小说《油断》,译者署名“渭文、慧梅”,代表叶渭渠、文洁若、高慧勤、唐月梅四位翻译家。也有把集体翻译的“XX编译室”用谐音化名“卞伊始”等现象。

这一时期出版的朝鲜作品也不例外,小说《袭击》译者署名“北大朝语教研室”;

16) 何琳《五十》[N]北京《华读书》2003年9月24

17) 马士奎《翻译主体地位的模糊化》[J],临《临沂师范学院学报》第28卷第5期,2006年10月, P137

《朝鮮短篇小說集》在每篇末尾的譯者署名大多數是“北大東語系朝語專業工农兵學員”，另有幾篇張永生、葛振家、伍浩等譯者署名，另有一位“延教”，應當是某個教學機構的化名；《朝鮮詩集》譯者署名“延邊大學朝文系72屆工农兵學員”，1977年出版《朝鮮電影劇本集》時，譯者署名仍然集體署名“延邊大學朝文系72屆工农兵學員”。直到1978年重新翻譯出版趙基天的長詩《白頭山》時，才開始出現譯者的個人署名“張琳”。

5. 2 從稿酬制度的變遷分析

中國的稿酬制度始於五十年代，一開始的模仿蘇聯的稿酬制度，採取的是“印數定額制”，即按作品的字數（或詩歌的行數）或著作頁為計算單位，通常是以1000字或以若干詩行（如10行、20行）或一個著作頁為計算單位，付給作者若干報酬。通常計算標準如下：著作稿每千字老人民幣6萬—18萬元（新人民幣6—18元、合今60—180元），翻譯稿每千字4萬—13萬元（新人民幣4—13元）。因為新中國成立前，實行的是版稅制，即賣一本書，就給作者/譯者一份版稅。實得固定印數稿酬制，自然引起作家和翻譯家們的不滿。例如翻譯家傅雷就對指出，一本十萬字的書印刷一萬冊，按每千字10元，才能拿到1000元稿酬，而且要賣到一萬冊以上再版時，才能再次拿到稿酬。而且優秀作品和一般的通俗讀物的稿酬應該有很大差距。但是傅雷的意見並沒有被接受，稿酬反而一降再降。1958年7月，文化部頒發《書籍稿酬暫行規定草案》統一了稿酬標準：著作稿每千字為4元、6元、8元、10元、12元、15元。翻譯稿為每千字3元、4元、5元、6元、8元、10元。比1953年的標準有所降低。新標準剛剛實施不久，就遇到了1958年大躍進，部分作家主動提出降低稿酬。1958年10月10日文化部發出《關於降低稿酬標準的通報》，因為“過高的稿酬標準，使一部分人的生活特殊化，脫離工农群眾，對於繁榮創作並不有利”，希望各地報刊、出版社將稿酬按當時標準降低一半。1958年實施了“印數稿酬+基本稿酬”的新制度，一方面減少了基本稿酬（比1957年平均降低20—30%），又在印數稿酬方面，採用遞減的辦法。作者所得稿酬，比印數定額辦法，明顯減少。

此後，隨著中國政治形勢的不斷左傾，稿酬不斷下降。1961年4月，國家下令取消了印數稿酬，只付基本稿酬，付酬標準與1958年10月相同。1962年5月，在“三年嚴重災害困難時期”後的恢復階段，一度恢復了印數稿酬。1964年7月，再度宣布停止實行印

数稿酬,稿酬标准维持每千字著作稿4-15元,翻译稿每千字3-10元。1966年1月,政府认为虽然取消了印数稿酬,但稿酬标准依然过高,又降低了50%的基本稿酬标准:著作稿为每千字2-8元,翻译稿每千字1-5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1966年6月起,各出版机构自动取消了作家和翻译家们的稿酬。“文章在报刊发表或图书出版,一律不付报酬。稿酬制度实际上被废止。”¹⁸⁾

5.3 从丧失作品选择权角度分析

本来译者在选择作品的时候,既受外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民族等的制约,同时也有个人意识形态和喜好的影响,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始于文革前盛于文革期间的集体翻译,却使译者从翻译创作活动的主体,沦为意识形态操纵下的“翻译机器”,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和个性。作品的选择,主要由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部门决定后,以“政治任务”的形式下达给翻译组进行集体翻译。所以,文革时期的集体翻译是在高度组织化的情况下进行翻译,译者完全没有选择作品的权利,而是把翻译工作当作是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译者在工作时通常要把一本书拆开,几个人分头翻译,最后由一人统稿。由于译者水平不一,集体翻译更是把复杂的文学翻译过程简单化为生产流水线,再加上缺少必要的工具书和相关的参考资料,这些译作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作品特别是某些工农兵学员的译作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原作的艺术特色。”

比起文革时期出版的一些质量低劣的苏联文学译作,这一时期以《朝鲜短篇小说集》、《朝鲜诗集》、《朝鲜电影剧本集》等朝鲜文学翻译保持了较高的翻译水平,从文字翻译到设计印刷都体现出了严谨认真的翻译态度,朝鲜文学翻译家们的这种努力令人钦佩。

6. 小结

通过对1950~1978年的朝鲜(韩国)文学翻译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阶段中

18) 《分人币代》(上海,2006年2)

国的一切文学翻译活动都是围绕“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时代主题展开的，而且冷战意识形态赋予了文学翻译以深厚的政治色彩，作品的艺术性退居衡量文学价值的标准的次席，政治思想性成为第一标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这一时期的个人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高度统一，形成了陈思和命名的“共名”状态。陈思和认为，“共名”是指一种文化形态，即时代本身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时，知识人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被掩盖起来。在这种状态下，作家精神劳动的独创性很可能会被掩盖起来，作家的个人性因素（包括个人的精神立场和审美把握）不能不与“共名”构成紧张的关系。作家的只要顺应时代主题进行创作，不管艺术能力的高低，写出来的都可能成为被时代认可的流行作品。¹⁹⁾

中国南北朝时期诗歌批评家钟嵘在《诗品》里谈论了“味”，唐代文学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提到了“体性”，晋人葛洪等人的著作中，把人的风度、品格、气质一类，称为“风格”。后世的文学批评家们则使用了风格一词，来翻译英文的style一词。译作的风格形成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原作的风格；二是译者的翻译风格。从原作的风格角度看，影响译作风格的因素很多，这里可以举出六点因素：一是作家个人的因素，即作家的个性、气质、文学观等等；二是作家的民族因素；三是作家所处的地域因素；四是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五是作品诞生的历史背景；六是作品的体裁和内容的因素。因为文学翻译也是一种艺术创作，所以译者的翻译风格和作家的创作风格是一脉相通的，惟一的區別就是译者应把原作的风格放在第一位考虑，译者的翻译风格也应服务于再现原作风格。

强调集体主义而压抑翻译家的个性和独创性，翻译家社会地位的下降，甚至集体翻译的盛行，使50~78年间的朝鲜（韩国）文学翻译呈现出“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状态。以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朝鲜诗集》为例，这本书是“延边大学朝鲜语系七二届工农兵学员”集体翻译，所收录的48篇诗歌，就像是出自同一个译者的译笔，而且丝毫看不出原作的风格差异。以下两首诗使用的就是典型的相同语气：

祖国的泥土散发着清香，
露珠儿深情地吻湿了战士的衣裳。
那湍急的流水声，
好似同胞们愤怒的呼喊，

19) 参考陈思和《共名与无名：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管窥》[J]，上海：《上海文学》，1996年10期。P7

战士们在激愤中难以入睡，
度过了宝贵的休息时光。”

(郑俊基《飘扬吧，普天堡的战旗》节选)

在日寇的法西斯铁蹄的践踏下，
在血泪汨汨的深夜里，
棍仗德的阴沉沉的风，
犹如祖国的凄惨的呻吟，
佳林川奔腾的水，
满含着民族的悲愤……
普天堡啊，
你是惨遭侵略者蹂躏的朝鲜的缩影！

(董基春《普天堡的火炬》节选)

强调作品的政治性而忽略艺术性，甚至压抑翻译家的个性和独创性，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一时期的译作，无论是语汇的选择、措辞特色、甚至句式、修辞，都几乎一模一样。不仅是翻译家的个人翻译风格被扫荡干净，连原作的风格也在翻译过程中被无情的删除。这一点，是这一时期朝鲜文学翻译的最大遗憾。但是也应考虑到，《朝鲜诗集》所收入的原作本身，也大多使用了那个时代流行的“战斗、控诉、煽动”一类措辞模式和风格。那么，这一事实可以证明中文版的《朝鲜诗集》是在冷战意识形态和官方话语的操控下，原作者和译者之间的一次成功的“合谋”。

参考文献

论文：

金长善《20世纪后半期韩国文学译介在中国》，北京：《世界文学评论》P283-285，
2006年2期，

韩昌熙《美帝控制下的南朝鲜文学》，北京：《世界文学》1963年第7月号

韩昌熙《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南朝鲜文学》，北京：《世界文学》（1-2月号），1964年
2月

- 邹振环《文学翻译史上的中国与朝鲜》，《韩国研究论丛》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
- 杨昭全《现代中朝鲜文学友谊与交流（1919~1945）》，北京：《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2期
- 查明建《文化操纵与利用：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构建》，北京：《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2期（总55期）
- 王友贵《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北京：《中国翻译》2003年9月第24卷第5期
- 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北京：《中国翻译》杂志，2007年1月，第23卷第1期
- 尹允镇 金顺女《建国50年来中国的朝鲜文学研究状况与未来》，延吉：《东疆学刊》2000年7月，第3期
- 刘为民《中国现代文学与朝鲜》，济南：《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3期
- 马士奎《翻译主体地位的模糊化——析“文革”时期文学翻译中译者的角色》，临沂：《临沂师范学院学报》第28卷第5期，2006年10月
- 朴忠禄 曹杰《南朝鲜爱国诗人金芝河及其作品》，延吉：《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P77-87，1983年1期
- 金英今《朝鲜、韩国当代文学比较》，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报》第23卷第2期，2000年3月
- 朴宰雨《韩国际合作精神的艺术表现——论中国现代小说里韩人抗日斗争的反映》，北京：《当代韩国》P4-8，2005年4期
- 王友贵《当代翻译文学史上译者主体性的削弱（1949-1978）》，北京：《外国语言文学（季刊）》P40-46，2007年第1期
- 沈仪琳《〈朝鲜文学〉载文批判南朝鲜文学创作中的心理描写倾向》，北京：《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1期

专著：

- 北京图书馆编 《1949-1986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 고인덕 등 《한국문학의 외국어 번역》，서울：연세대학교 출판부，2004년8월
- 谢天振 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科
院，2004. 9
- 查明建 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2
- 杨昭全《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1月
- 孟昭毅 李载道《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

<Abstract>

Research of Korea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 Chinese
from 1950 To 1978

Kim, Hakcheol

Suwon Science College

The activity of translation has an upsurge in the mid-1950's. A great number of foreign literary works were translated in, in a planned way. The upsurge gradually being cooled in early 1960's, and it was interrupted because outbreak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mid-1960's, until the later Cultural Revolution. review the activity of translation between 1950 and 1978, we found that all of the activity of translation aimed at "safeguarding and build up Socialist System. The activity of translation covered by a strong political flavour, because the ideology of Cold-War. Artistic quality is no longer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artistic value. Politic edeology take place to the artistic quality. Be effected by this kind of edeology, negation is main attitude to Korean literature for Chinese writers.

Key words : ideology (意识形态) , cultural manipulation (文化操纵) , literature translation (文学翻译)

투 고 일 : 2008년 7월 15일 / 게재확정일 : 2008년 8월 15일

K C I